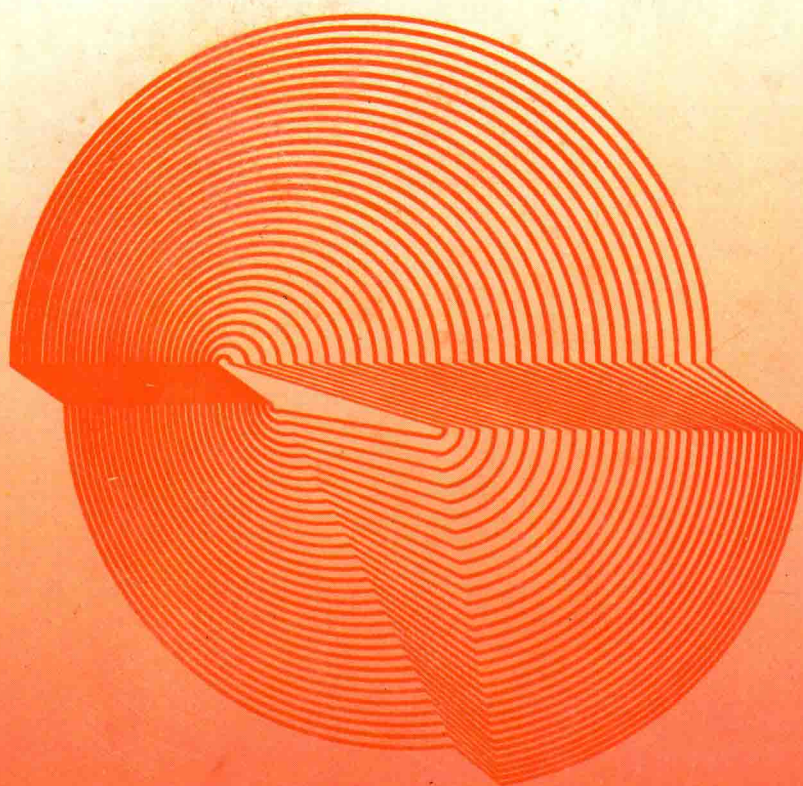


中國科技論壇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 ●

1994

《中国科技论坛》目录

1994. 1. (总第 51 期)

●本刊特稿

- 1 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的纲领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 于维栋

●发展战略

- 5 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几点意见 岳颂东
9 政府职能转变与星火计划发展战略设想 向清
13 西部乡镇企业如何腾飞 庾德昌 张军

●政协委员话科技

- 18 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进步的问题及建议 全国政协科技委

●省委书记话科技

- 23 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 何竹康

●科技与社会

- 26 走我国持续发展的新路
——《中国 21 世纪议程》国际研讨会报道
29 制定《中国 21 世纪议程》，造福人民 甘师俊
32 联合国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建立技术评价能力方面的建议 孔德涌

●科技兴市

- 34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科技兴市深化发展 欧阳德
36 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商丘经济 蒋琦
37 民族地区“科技兴市”的新思考 王永夫 刘志伟

●技术创新

- 39 技术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来兴显
42 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地区特征 高建 柳卸林

●纪念文章

- 46 源于实践，复归于实践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 谈家桢
49 毛泽东发展国防科技思想指引中国航天事业走向世界 胡增军 侯力军

●探索与争鸣

- 53 企业的市场营销与科技进步 杨德忱 刘叙和
57 我国科技人员的总体素质为何不高 刘云

●国际之窗

- 60 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的效率 吴仁洪 陈越

●书评

- 64 创造性探索 吴明喻

主 编：孔德涌

副主编：穆恭谦 张万斌

编 委：(按姓氏笔划)

于维栋	孔德涌	马居正	甘师俊
叶 丹	石定环	刘 吉	关士续
李宝恒	李学勇	邱成利	杨维哲
吴明瑜	吴武封	宋泽厚	张登义
张万斌	苑广增	罗 伟	明廷华
胡 平	胡兆森	段瑞春	贾蔚文
徐肇翔	龚育之	常 平	黄英达
赵喜晨	黎懋明	穆恭谦	

封面设计：吴冠英

版式设计：秦小平

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的纲领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

于维栋

伟大的历史意义 现实的理论指导

时代的列车正在高速度向 21 世纪前进。在这个世纪的最后的年代，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展望未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有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本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好的教材。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不仅对于全党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全国人民，对于全国的科技界，对于发展我国科学技术，都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用世纪的眼光来看问题，我们就会更加深刻理解眼下所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意义。

19 世纪是中国衰落的世纪。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侵略军大肆烧杀掠夺。中华民族带着耻辱进入了 20 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名存实亡。经过半个世纪的浴血奋斗，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重新又成为政治大国。建国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国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成为一个军事大国。80 年代之后，我们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正在向一个经济大国顺利前进。应该指出，过去 10 年我们之所以在经济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了改革开放，坚持了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

这样看来，20 世纪将以中华复兴的世纪载入史册。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将在未来的世纪继续完成这一事业。我们要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把中国建成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要完成这样一个十分艰巨而又复杂的伟大任务，关键是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并使这个理论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我们今天学习《邓小平文选》，深入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就一定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建设以更快的步伐进入 21 世纪，促进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的顺利完成。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有一整套完整的论述，这是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就有 11 篇谈到了科学技术和人才问题。在第一、二卷中,也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论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并使之向前发展了。因此,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就可以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and 作用,进一步理解党的科技工作方针政策,顺应时代的要求,把自己的工作搞得更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深刻领会一个指导思想

作为革命的战略家,邓小平同志首先把科学技术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相联系。他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54—255 页)^①“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183 页)。“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275 页)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255 页)这条道路是什么?就是依靠科学技术的道路。作为这条道路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观点。1978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重申了这一观点;1988 年,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74 页)。这就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竞争力的提高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研究了大量历史材料、特别是研究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所形成的近代机器工业生产之后,作出了“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的论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 8 分册第 350 页)按一般的理解,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那么科学技术和这两个基本因素是什么关系呢?邓小平同志作了最好的说明:“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 年 3 月)在这里,邓小平同志认为科学技术和生产资料、劳动力这两个生产力的基本因素的关系,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渗透性的关系,即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渗透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中而存在,而发生作用的。正是因为这样,它是一个可变的因素,必然会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17 世纪,18 世纪,19 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同上)

马克思去世之后,人类又发生了两次全球性的产业革命,即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电力革命和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工艺不断更新,生产力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突飞猛进。邓小平同志研究了这一切变化,特别是六七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近 30 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科学理论上、个别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① 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下同

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代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同上)。

在这一段论述里,邓小平同志已经充分地论述了当前世界上正在兴起的新科技革命的主要特效,这些特效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的。这些特效主要是:

1. 现代科学技术几乎在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新的飞跃,并在不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

2. 当代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速度应用于生产,从而使科学原理应用于生产的周期大大缩短,在一些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科学和技术的界线已经日益模糊了。

3. 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从学科来说,不仅物理、化学、数学原理广泛地应用于生产,而且天文、地理、生物以及其他学科,也不断广泛地用于生产领域,而由于各种学科综合地用于物质生产过程,使人类劳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地球表面扩大到地下,从海洋表面扩大到海洋深处,从地球扩大到宇宙空间,从原子的表层到原子核,等等。

4. 一系列新产品、新工艺和新工具不是来自现有产品、工艺、工具的改进,而是来源于科学实验室,因而是全新的。因此,当前新科技革命的带头人已经不是熟练的高级工匠,而是科学家和工程师。

5. 一系列新的产业不是来源于传统产业的改造,而是来源基础科学研究。原子物理学在半个世纪以前还只是少数科学家研究的科学,而现在在它的基础上已经成为庞大的工业部门,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现在全世界每6度电力就有1度是由核能转化而来的。基础研究已经成为新产业的先导。今天的基础研究,就是明天的技术,后天的产业。

6. 软科学应运而生。邓小平同志在上面讲到的“继续产生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了软科学。软科学也是生产力,它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对于生产技术的发展方向,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的规模和速度,都产生巨大的作用。

由于这一切变化,这种种新的情况都显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到了80年代,科学技术这种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已经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而是产生了质的变化了。首先,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因素已经占据了主要的份额,这一趋势在工业化国家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这些国家,本世纪初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只占10—20%,而在80年代,已经占60—80%。其次,由于高科技的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经济的竞争,而商品的竞争力则主要是由物化于其中的技术含量决定的。正是根据这样的大量的生产力发展的最新的材料,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新的论断在理论上讲,是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在实践上讲,对我们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确把握两个战略原则

邓小平同志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把科学技术工作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并且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出发,规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原则。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是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一个战略原则提出来的。“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

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79—280页)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出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奠基典礼,亲自为工程奠基。1986年3月,邓小平同志对四位科学家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作了指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作决断,不可拖延”。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支持和推动下,同年11月,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并于1987年组织实施。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发展高科技,在我国来说首先要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高技术的先导。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工作。再一点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是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全面出击。这是从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这样的国情出发的。因此,我们在领会、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这一原则指示的时候,选准战略重点领域和重点课题,把我们有限的力量用在刀刃上,这是十分重要的。

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是邓小平同志经常强调的科技发展的另一个战略原则。在1985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对到会的科学家说:“中央要求科技界面向经济建设,你们是出了大力的。同志们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我们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走到工厂,走到地方,到处都受欢迎,到处都请你们谈战略,谈远景,谈规划。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需要通过科技和经济两方面的改革去解决,“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108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两个战略性原则,即必须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则和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原则是统一的。它的高度的统一性集中表现在邓小平同志为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所作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之中。这两个原则是一个战略的两个方面,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符合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强调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而对基础科学研究有所忽视,另一些同志则是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而对与经济建设相结合重视不够。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没有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而造成的。1993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工作政策原则,这一原则很好的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我们应该认真贯彻落实。

事业成败的关键是人才

要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关键是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小平同志其它著作,许多地方都谈到人才问题。人才问题是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论述的核心。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文选》1975—1982,37页)“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上,38页)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91—92页)1985年,在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同志又说:“改革经济体制,(转25页)

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几点意见

岳颂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一年多来,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对于加快本地区发展的呼声很高。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虽说发达地区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以进一步激发那里的活力,但少数民族地区同志也充满信心地表示:我们决不能坐等,要努力跟上全国发展的形势,要胆子更大一点,步子迈的再快一点,在新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较大的作为。

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如何根据区情地情搞好改革和建设,他们想说的话很多,想做的事很多。为了沟通情况、统一认识、集思广益,我们曾召集了8个少数民族省区、25个自治州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座谈和研究,现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要介绍如下。

一、正视差距,使民族地区的自身发展与争取外援相结合

与会代表比较集中的话题,是谈论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他们认为,差距的扩大有历史的、现实的原因,有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也有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此,必须全面地分析和综合地考察。

按照发展《纲要》的要求,90年代我国全国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必须保持年递增6%以上的速度。若要使少数民族8个省区到2000年能赶上发达地区,则必须保持年递增14.6%的速度。从现实情况来看,确实十分困难。由于基数差异较大,民族地区要在短时间赶上发达地区仍不现实,但缩小差距是有可能的。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差距是会存在的,但不能过大,否则会影

响社会的稳定。少数民族地区要赶上发达地区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一要靠国家的继续扶持,二要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三要靠民族地区自身的努力奋斗。

为了缩小这种差距,国家应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入。现在国家每年向民族地区的投入包括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的资金,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费,对少数民族地区财政的定额补贴,对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建补助费等等。由于种类繁多,多家掌握,分散使用,效果未尽人意,这种状况有待改善。今后,应对这些资金重新组合,捆在一起,集中使用,以形成规模、重点投入。地方财政也可根据自身的财力状况,考虑资金的变通使用方法,如将3~5年的投入捆在一起一次投入。这样可能办几件大事,取得较显著的效果。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因此,运用非均衡发展模式,先让一部分地区富起来,然后由先富地区形成的经济生长点和辐射区带动其它地区发展,也是可行的。国家应建立民族地区交通、通信、教育、卫生四项专用基金,通过多方筹资,用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务院和省区确认的贫困县内,国

家应把部分税收返还当地,纳入四项专用基金,以扶持贫困民族地区的发展。

基于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过去我们在行政区划上较少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因而不利于商品的集散及流向,不利于经济要素的合理分布和优化配置。对此,可在听取当地民族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适当调整部分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使之有利于地区整体上的脱贫致富,有利于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对外开放。

为了确保全国普遍实现小康目标,应制订旨在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的“团结计划”,使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自愿结成对子,省对省、市对市、县对县,乡对乡,从现在起到 2000 年,双方全面规划,做到定点、定员、定时、定项,把任务落到实处。国家对“团结计划”应给予一定资助。在落实该项计划中,要本着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彼此互利的原则,既不搞“一平二调”,也不搞包办代替。要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发达地区提供人才、技术、资金,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原料、土地、劳力和人文资源,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其产生互补和聚集效应,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次民族工作会议中许多代表认为,扶贫是当前民族地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据《中国民族统计》提供的数据,全国 30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面积为 239.4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 25%);人口 4199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2487 万人(占各州人口的 59.2%);1990 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 1352.8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499 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 5 个州(仅占 1/6),最低的一个州仅 361 元(为全国的 29%);人均财政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而人均财政收入在 100 元以下的有 17 个州(占 57%),最低的一个州仅为 28 元(为全国的 7%);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仅有 8 个州,最低的一个州仅 268 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43%),除延边外,其余 29 个州均为赤字州。又据有关资料介绍,截止 1989 年,在国家扶持的 331 个贫困县中,有 141 个是少数民族贫困县(占 42.6%),未解决温饱的人口达 1500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1070 万人(占贫困人口 71%)。因此可说,当前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要害问题是先要做好扶贫工作,尽早完成温饱工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贫困地区中,象云南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等,都属于特困地区,那里偏僻闭塞、交通不便、高寒缺氧,生存条件极度困难,这类地区的扶贫工作要特殊对待。

少数民族地区要搞好自身的发展,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据 8 省区截止 1990 年的统计,共计乡镇企业 271.5 万个,就业人员 641 万人,总产值 273 亿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总的来说起步晚、投入少、基础差、技术低以及还有 20%左右的乡镇没有办起自己的企业,所以发展缓慢的状况有待改善。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农村开展“一村一品”运动的经验。我国民族地区富有传统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食品、日用品、药品、保健美容品比比皆是,如果加以创新、改进和进行详实的市场调查,推出一批名、特、优、新产品去参与市场竞争毫无问题。

二、打破二元结构,由当地中央直属企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单一、产品链短、结构缺漏,座落在民族地区的中央直属大中型企业成为被自然经济包围的“飞地”。中央与地方企业在技术、规模、产值等方面反差很大,相互渗透性、融合性较差,形成鲜明的二元结构。另外,在管理体制上,中央企业为“条条”管理,地方企业为“块块”管理,这种条块分割,使得中央企业很难发挥其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因此,通过改革,发挥中央企业的优势,带动民族经济的发展,正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大问题。

目前,民族地区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以及市场需求的日用工业品多由外地调入,而重工业产出的原料又大部分调出,这种轻重工业不平衡、不衔接的状况导致了地区经济利益的流失。这种“两张皮”的状态亟待改变。再之,民族地区原材料产品价格偏低的情况多年来一直未能改变,这也是导致民族地区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例如1990年国家对于原油的最高限价为748元/吨,而新疆输出的原油却大部分为平价(216元/吨)或计划内高价。价格的偏低,不仅影响到地方经济的活力,而且因产品税征收的减少,影响到地方的财政收入。此外,民族地区还存在着产品税计征偏低的问题。例如按财政部规定,原油产品税的计征全国统一税率为12%,而新疆依然保持为5%的水平。还有,由于产品税分成地方偏低(中央与地方为七三开),使得地方实际受益不多;由于石油开发、产品计划实行国家统配管理,使得地方难以参与规划和统筹运作,产生了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的矛盾(如油田与农田争水、地方水源遭污染、植被遭破坏等),这些两难问题有待尽快解决。

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地方自然资源。因此,民族地区理应参与地方规划和管理。对于中央直属企业需要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央应与地方政府共同规划,民族地区应参与决策过程。大中型企业的用地、用水,应由国家投资,中央与地方共同管理,合理地有偿使用,或由中央企业产生的效益中返还一部分归地方使用。国有大中型企业应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比如由中央企业生产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石化产品、电力、有色金属等,应划一部分给地方,由地方兴办或双方合办中下游产品企业;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下,按照经济的内在联系,组成区域性或行业性股份制企业集团,在统计上分割产值、利税额等指标。暂时建不成企业集团的,应鼓励中央和地方相互参股;新办的大中型企业应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工人,加强技术培训,壮大少数民族工人、干部队伍。

三、扩大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努力完善法规政策

中央1992年4号文件下达后,我国已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最近一段时期,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形势喜人。为了推动民族地区进一步对外开放,我们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1. 重视中亚地区市场的开拓。中亚地区战略位置重要,近年来,随着原苏联的解体,美、英、法、德、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国的势力竞相进入该地区,日本、南朝鲜、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我国的台湾对该地区的经贸活动也十分频繁,我国应抓住时机,利用地缘方面的优势尽快打进去,扩大经贸往来。中亚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5国总面积399.4万平方公里,人口5100多万,市场购买力可达1200亿美元。因此,开拓中亚市场和进行转口贸易前景广阔。

2. 要打破边贸活动中的部门垄断和相互掣肘,实行全民、集体、个体一齐上,赋予经贸实体以更大的外贸经营权。边疆地区的口岸建设以实行土地使用的租让制为好,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租地办厂办店,口岸区所得租金可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应积极在口岸建立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以吸引外商进行转口贸易;应加强边民互市和购物旅游的外汇管理,以避免大量外汇流入个人手中;应在周边各国边境地区建立商务代表处,设立贸易机构,以方便贸易协定的鉴定和给予必要的短期商务贷款。

3. 加强边贸“硬件”和“软件”的建设。边境口岸交通、通信、检测、仓储设施的建设应加快,但全由国家投资较困难,因此采取“利税返还,以岸养岸”的方针较为适宜。凡新建的口岸,应在

3~5年内将其所得关税返还当地,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口岸应加强诸如海关、检疫、边防、公安、工商、税务、环保等部门的“软件”建设。可确定适当编制,完善人员结构,加强业务培训,优化营商环境。

4. 边疆民族地区宜与内地、沿海联手,共同发展周边国家贸易。目前,边贸出口大多限于农产品、轻纺产品和日用百货,这在初期是可行的,但此种格局难以持久。边贸的持久性在于不断调整其互补性。为此,要从长计议,应以优惠政策吸引内地、沿海和海外人士到边疆去办厂,争取用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去出口创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建跨国公司扩大经贸范围,将产品向东欧、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市场延伸和推进。

四、大力培养和吸引各类人才,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匮乏,民族科技人员比例不高。据1990年的统计:少数民族工程技术人员34426人(占全国同类人员的2.19%),农业技术人员18946人(占6.44%),卫生技术人员53264人(占4.18%),科研人员7150人(占2.3%),教学人员27164人(占3.04%)。人才的奇缺对于办企业、搞管理、推广新技术来说都很困难,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综合对策,一方面要稳定住现有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要采取吸引措施,鼓励全国各地科技人员到民族地区工作,方式可多样,政策要兑现。

可采取聘任制、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多种形式吸引各地各类科技、管理人员来民族地区兴办乡镇企业或建立经济实体。应切出他们创效益中的相当一块用于对他们的奖励。对于自愿到民族地区搞开发的科技、管理人员,应采取原单位停薪留职、工作数年允许返回的政策,对于到民族地区工作的回国留学人员应采取热烈欢迎、妥善安排、来去自由的政策,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应鼓励民主党派、民间团体、内地教育界的离退休人员到民族地区办学,或支持他们在原地办学,专门培训少数民族干部。要把培训与当地的开发结合起来,拨出一部分开发成果资金支撑教育。国家教委和国家财政部门要大力资助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民族地区要通过农中、普中强化职业技术教育。要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要使更多的青年只少掌握一门建设家乡的有用技能。现有各类学校应利用假期举办农业干部培训班,重点培训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和复员转业军人,让他们发挥科技“种子”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当地能工巧匠和科技专业户的作用,推广他们擅长的技艺,带动群众共同致富。除有关大学为培养民族干部对入学少数民族学生适当降分录取外,这些学校还应考虑增设民族学员代培班,专门培训民族专业技术人才。

为减少和防止民族地区人才外流,应采取非行政强制的凝聚措施。应允许民族地区科技人员从事第二职业,如在一些乡镇企业和县办企业中兼职,或挂职领办县乡企业,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并体现多劳多得。

(责任编辑:张万斌)

政府职能转变与星火计划 发展战略设想

向 清

国家科委研究中心

自 1986 年开始,国家科委组织实施了一项旨在依靠科技振兴农村经济的科技计划,即星火计划。星火计划出台后,经历了布点点火和提高水平、形成规模两个阶段,从“短、平、快”技术开发项目起步,到技术示范推广、人才培养,以及扶持区域性支柱产业、产业集团和星火密集区的建设,其战略目标和工作重点也随着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7 年来,通过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示范引导,星火计划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商品经济发展、引导乡镇企业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增强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的科技意识、培养农村科技骨干队伍以及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了国内外的承认和全社会的关注。

作为由国家科技管理部门推出的第一个指导性科技计划,星火计划在组织结构、计划制定、资金运用、管理方式诸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项目选择依据市场需求,项目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并采用了“国家引导、多方集资、有偿使用、扶优淘劣”的金融与科技相结合的资金运用方式。这些特点说明,星火计划顺应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对政府管理方式改革的要求,这也正是迄今为止星火计划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

当前,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政府体制和政府职能发生相应的转变。在这种新的政

治经济环境中,如何更好地实现星火计划的宗旨——依靠科技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如何确定下一阶段星火计划的发展战略目标,是有关领导和管理部门十分关心的问题。探讨星火计划的发展战略,不能仅从星火计划出发,而要站在搞好政府管理的高度考虑问题,从政府在科技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研究科技计划的目标和管理,从而促使政府管理迈上新台阶。这个新台阶可称为“突出宏观调控职能,调整科技计划体系,加强计划的战略管理,下放项目管理权限,减少行政干预,全面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下面首先对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功能以及计划的作用问题,提出科技管理体系调整和下一阶段星火计划发展战略的设想。

一、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

1. 法的原则

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法律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的主要职能——行政管理越来越倚重法的手段,政府的行为也受到法的约束。我国法治传统薄弱,社会生活中“无法可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十分严重,必须大力加强法制建设。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服从法律权威的风气,政府管理亦须切实纳入法的序列。

法的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用法律形式明确政府机构的职能,以保持其权威性和稳定性。这方面我国做的还远远不够,特别是

国家综合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确,有关权限的纠纷很多,这在科技计划制定与管理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法的原则还应体现在管理过程中,比如用法律、法令形式保证预算分配以及政策、计划的实施等。

2. 效率原则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效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准则,中国要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也必须高度重视效率的作用。在政府管理中,注重效率指的是选择以较少投入(资源、时间、人力等)获得最好效果的管理方式。这就要求政府在考虑对某项活动的管理时,必须权衡各种方法的利弊,选择最有效率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采用最熟悉的方法。比如科技管理部门往往沿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惯用的计划形式,形成了现在这样科技计划只增不减,体系越来越庞大的局面,显然有悖于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趋势。

3. 时间原则

人类的活动要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就不能不考虑时间这个因素。对各种活动的管理也不能不注意时间变量,否则就不能取得好的效果。这具体体现在管理方式、方法必须随时间变化,不能把此时有效的方式不加思考地搬到彼时,必须承认一切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科技计划也不例外。

时间这个重要维度在我国管理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制定计划无时限、管理机构刚化、资金投入不计时间因子等。当然,注意变化并不是不要相对的稳定性,而是指管理的规范要随时间变化,这种变化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如通过法的程序改变。管理随时间而变亦是效率原则的要求,每个时期都有其效率最高的管理方式。

二、政府在科技活动中的地位 and 作用

建国 40 年来,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行政干

预。

改革开放后,此种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改观,经济科技工作的计划性开始松动,市场调节成分增加。这一时期,出现了由不同层次和目标的科技计划(一般是中期的)构成的计划体系,代替了原来的长期科技规划为主、年度计划为辅的组织形式。科技计划的管理也从单纯的行政驱动向行政和经济手段并用转变,增强了科技工作的活力。但是,这些科技计划仍然没有摆脱目标过于全面、涵括所有活动的思维定式;再加上各部门权限不清晰和部门利益刚化等原因,各个科技计划之间界限不明、交叉重叠的状况反而更为严重了,这样国家本来就极为有限的科技投入不能集中用来保证重点目标的实现。科技管理部门热衷于具体项目管理,低效率、滥用权力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既不利于搞好宏观管理,还有碍廉政建设。

那么,政府究竟应当怎样管理科技活动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功能应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制定竞争规则,培育竞争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功能就是允许经济要素按价值规律自由流动,以便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创造最大效益,竞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平、有效、就必须有合理的竞争规则和适宜的竞争环境,而制定竞争规则、维护竞争环境的任务只能由代表国民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来承担,这是现代国家政府的一项基本功能。

竞争首先要有开放的市场、人员、物质、资金、信息等要素可以在市场上流动,这就需要进行市场建设,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市场。有了市场,还需制定交易的规则,以维护交易双方的权益,因此必须制定有关的法律和监督实施机构。但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它在某些领域会失效,也不能保证资源配置符合社会的长期利益或价值标准,因而政府还要制订相应的政策,约束和引导市场机制作用的

范围和方向。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市场发育不足,法律规章不完备,市场竞争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政府更需花大气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应该是现阶段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

2. 制定国家战略,保证重点目标

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政府积极介入社会经济活动,用各种形式干预社会生活,其主要干预形式之一就是制定国家战略,这在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和地区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与此同时,各国都意识到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有可能靠发展科技迅速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乃至国际地位,因此,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政府全面资助和管理科技活动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比较有效的方式是由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活动,并组织重大高新技术或某些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技术的研究开发;其它科学技术活动交由企业和市场自主进行,国家可以给予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

在对科技活动的管理方面,各国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基础研究通常实行基金制,采用专家管理模式(本文中有关科技计划管理模式的内容,请参见“中国科技计划体系及管理模式”,《科研管理》,P₄₋₇);政府资助的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经常采用科技计划形式,一般采用准集中管理模式;其它科技活动则不用计划形式加以管理。这样的分类管理,可以保证政府将有限的科技资源集中用在重点目标上。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计划只是实现国家战略的一种组织和管理手段,它的目标应当是有限的、明确的。而对大量面广的科技活动,政府应主要运用政策法规予以宏观指导,这样才能提高政府和民间的工作效率,也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我国科技管理体系调整的初步设想

在中国,科技计划的范围从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开发、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到新产品试制、技术成果推广,应有尽有,现在还有扩大的趋势。这些科技计划的管理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是在过去惯用的行政管理模式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经济手段,如合同制、贷款、有偿使用等,体现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过渡特征。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环境,我国科技管理部门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工作定式,明确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怎样管。可能的决策程序是:首先根据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并考虑经济、社会方面的近期或远期需求,结合科技自身发展的需要,确定科技工作的战略目标。接着把总的战略目标分为一些具体工作目标,并研究确定这些具体目标的相互关系,以便在资金分配、人才培养时有明确的科学依据。(现在科技经费分配只讲在稳定基础上逐步调整,而不去研究目前的经费比例是否合适,是不是须做大的变动)。然后,研究每个目标应该如何实现,政府如何干预的问题,即选择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经研究确定必须采用计划形式的,也须先明确任务,据此选择合适的管理方式。至此,才能开始制定计划。现今实际的做法常常是本末倒置的。

基于前面的论点,我国的科技管理体系可做如下调整:

①保留以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研究开发为目的的科技攻关计划,制定以重点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为内容的科技计划(与863计划的任务不完全相似),这两个计划可采用准集中管理模式进行管理。

②基础研究及相关活动(如重点实验室建设)均采用基金制管理,同时实行有重点的倾斜方针,沿用专家管理模式。

③政府负责组织重大农业和社会公益性技术成果的示范推广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给予经费支持,但不一定采用计划形式。

④一般技术的研究、开发、商品化、普及根据市场需要和经济原则自主进行,国家对这类活动进行宏观导向和政策扶持。

⑤政府帮助各类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中试基地、技术信息服务网络的建立和发展,初期可给予少量经费支持。

当然,以上所述是一种目标状态,在过渡时期需要采用过渡形式。但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应认清目标,不失时机地采取合理的改革步骤,这些步骤应有利于最终达到目标状态。

四、星火计划发展战略设想

从上面的科技管理体系调整的设想中可以看出,星火计划的内容是不应该用计划形式管理的,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乡镇企业自行选择项目、申请贷款、实施并自负盈亏,完全符合乡镇企业的运行机制特点。但是,鉴于目前还存在着市场不规范、技术信息不畅、科技意识薄弱、资金极为短缺、企业管理水平低等问题,为保证星火计划推动的乡镇企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工作不出现倒退,下面提出一个过渡阶段的星火计划发展战略设想。

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经济、社会效益并重,以省级计划为核心,因地制宜提高乡镇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扶持地区支柱产业,依靠科技振兴地区经济。

制定计划的基本原则是:

1. 有限目标、分散管理的原则。

这个原则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要明确区分星火计划与现有的其它科技计划的界限,建议星火计划项目集中在适用于乡镇企业的技术成果商品化和示范上,不必介入技术开发项目和农业技术项目。

二是国家不参与项目立项、评审、实施,而由各省(含直辖市和自治区)负责星火项目的立项和实施,下面仍可设县级计划。

2. 政策调控、分类指导的方针。

国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针对各省不均衡的发展水平,帮助各省决定各自的

星火计划之具体目标。目标取向可以是经济效益、扶贫、就业、支柱产业、规模经济、出口导向等,总之要针对各地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

同时,国家负责制订相关的产业政策、环保政策、技术选择和项目评价指标,指导地方选择星火项目。根据各省不同的目标取向,可采用“通用指标+专项指标”的形式,各省可参照使用。如以就业为目标的,可选择“单位投资安排就业人数”的专项指标,等等。

3. 积极改善软环境,推动星火项目全面进入市场,最终结束星火计划。

为保证上述设想的实现,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①国家尽快制订具体明确的政策法规,使项目评审、资金使用、科技贷款、技术合同、税收、价格、奖惩等相关工作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为保障各投资方利益,可试行股份制。

②建立、完善国家和省级技术信息服务网络,推动技术市场建设,促进星火技术的扩散。

③加快全程产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步伐,为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要求每一地区都要设立技术服务机构,提供技术咨询、项目可行性分析、市场调查等服务。这类技术服务机构可在地方科研、信息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先由地方政府资助管理,以后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④继续重视人才培训工作。各省要在巩固现有星火人才培训中心的基础上,按合理布点原则建立新的人才培训基地,并积极开拓新的培训内容、形式,实行有偿服务。现阶段的培训重点应是乡镇企业管理人才。

⑤加强国际交流,促使星火计划国际化。

为保证上述措施的执行,国家仍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一方面要保持目前的拨款额度,另一方面应努力争取外资。

(责任编辑 潘令珊)

西部乡镇企业 如何腾飞

庚德昌 张军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

一、西部乡镇企业为何难以腾飞

1992年,我国乡镇企业已发展到2000多万家,从业人员近亿人,年创产值1.6亿元。但是,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却是极不平衡的,概括起来说就是:东部沿海地区所占比重最大,其产值已占到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66%以上;西部所占比重最小仅占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9.44%。

从发展速度上看,1988~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的年平均发展速度为21.4%,其中,东部地区为21.5%,西部地区为20.8%,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仅比全国水平少0.6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少1.7个百分点,说明在这段时期,东、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大体维持了一个相同的发展速度。从产值比重上看,东部地区的比重1991年比1988年上升了0.0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了1.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产值比重下降的原因在于西北五省的产值比重下降过大(1.9%),以及同期平均发展速度只有18.8%,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见下表)。

1988~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统计 单位: %

	1988年	1991年	年平均发展速度
东部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66.64	66.72	21.5
西部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9.58	9.44	20.8
西北五省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2.93	2.74	18.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乡镇企业统计摘要,1989年和1992年计算。

注:东部和西部的划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

尽管近几年西部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其产值的绝对数量增加较猛,如四川省1992年的乡镇企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但由于东部地区同样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的格局,西部乡镇企业占全国总量的低比重格局无较大改观和实质性的突破,甚至不平衡发展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造成东西部乡镇企业发展差距扩大,或者说,西部乡镇企业难以腾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生产没有过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大,但却不能通过自身的发展,为非农产业提供所需的剩余产品和积累资金,以便在农民货币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下,发育和形成一个不断扩张的日用消费品市场,从而有效地带动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在由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换阶段,农业生产作为收入和增长的来源,支撑了转换阶段的

经济发展,并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其一,提供了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其二,促成了日用工业品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张。1992年,西部地区农业产值占该地区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62.32%,但除了少数省份自然条件较好,农产品,主要是粮食产品能够自给自足外,多数省份的粮食人均占有量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西北五省农业生产更为落后。不但粮食不能自给,而且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并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农业作为西部农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必然直接影响到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首先,农产品供给的紧张关系,抑制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的发展。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当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小康过渡时,生活质量提高,扩大了以农副产品为加工对象的食品的需求,有利于该类企业的发展。西部地区总体粮食供给不足,粮食供给的瓶颈限制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的发展,从而使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背离了普遍认为的经济发展轨迹,即放弃具有较高收入增长弹性市场潜力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代之以发展经济效益不高的采掘业和缺少比较优势的加工业。其次,作为第一大产业的农业,不能使农民的货币收入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当然也就无力推动当地日用消费品市场的扩张。一旦市场扩张的速度不能满足乡镇企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十分容易造成某些或大部分行业进入过量,其结果引发区域内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如果这样的竞争是处在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下,竞争的结果,必然会产生少数几家骨干型企业。然而,传统城乡分割的体制已基本不存在了,地区壁垒的封锁也难以阻止商品的地区间、城乡间流动,因此,竞争也不仅限于区域内企业间的竞争,它还有区域之间企业的竞争,主要是发达地区企业与落后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双重竞争的结果,使得优势向技术先进、管理科学、具有规模效益的发达地区企业倾斜。在这样的环境下,西部地区乡镇企业难以腾飞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西部地区超重型产业结构,弱化了城市工艺与乡镇企业的联系,从而使西部乡镇企业发展失去了一个支点。乡镇企业的发展,到目前还不可能纳入国家计划范畴,但从其具体发展的运作过程看,它多少与自然资源的分布,与城市工业的布局有着联系。例如,乡镇机械和纺织、缝纫工业中,86%的机械产值,90%的纺织和缝纫产值均来自东部地区,采掘业则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产值占到同行业的70%以上。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地域格局的一致性,说明了区域工业传统与乡镇工业之间的联系和重要影响。

有色金属采掘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重加工工业,在西部工业中占有重要比重,从而塑造了西部的超重型工业结构。这一超重型结构,对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利影响。其一,由于采掘业的比重大,增长率低,会影响西部经济的总体增长率,使乡镇企业发展失去一个可以依托的宏观环境。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加工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最高,为16%以上,其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加工业增长次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相差不多,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采掘业增长速度最低,仅为加工工业增长速度的41.25%。由于西部工业结构中,采掘业和重加工业占有相当比重,因而影响到了西部总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制约着积累和消费规模,从而通过货币收入规模 and 市场规模两个方面对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约束作用。其二,超重型工业结构,弱化了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的联系,使乡镇工业无法与城市工业生产配套,从而失去了本应存在的发展支点。采掘业和重加工工业一般具有生产链条短,生产的可分性弱,生产上分工协作的机会大大减少。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在生产上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乡镇工业接收来自城市工业有关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辐射的机会也减少了,这无疑会加大西部乡镇工业发展的难度,并延长西部乡镇企业由初创期到高速增长长期转变的时间过程。其三,西部乡镇工业的产品中作为可贸易部门的产品所占比重甚小,因

而难以推动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中,投入品市场和产出品市场两头在外的可贸易部门所占的比重越大,发展得越快,本地收入的提高和需求的扩大就越快,因而会对区域经济的全面增长产生“乘数效应”,成为当地工业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西部乡镇工业中可贸易部门所占比重过小是与西部农产品供给短缺、当地自然资源分布及获取容易有关,也可以说与西部超重型的工业结构有关。西部乡镇工业,可贸易部门比重小,说明西部乡镇工业受当地原材料供应和市场需求制约性强,说明西部乡镇工业利用市场组织原材料,组织生产,组织销售的能力弱。西部超重型的工业结构,虽然弱化了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的联系,但却派生出了另一个与自己相差无几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乡镇工业。

第三、乡镇企业发展机制的错位,抑制了西部乡镇企业的腾飞。与动员型经济相联系的是乡镇企业创办初期形成的“模仿竞争”和“投资竞争”,即通过对他人成功的模仿,抢先投资,抢先占领和进入刚刚显示有着良好盈利前景的行业和市场或地区。一句话,就是利用各级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进行投资,在短时间里建成一些项目。在确实存在一个确定程度较高的市场空间环境下,这样的竞争机制,有利于形成企业先入为主的优势。这种竞争机制的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具有很强的短期行为特征,缺乏向前看的全局发展观和对自身条件的客观评价,所以十分容易造成行为进入过量和市场的不稳定。

随着市场空间确定程度的降低和不确定程度的提高,“模仿竞争”和“投资竞争”被技术竞争和销售竞争所取代,竞争机制的转换划分了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目前,东部乡镇企业已完成了竞争机制的转换,并由外延发展转向内涵发展,由重视生产转向重视市场与生产。而在西部,乡镇企业仍停留在模仿和投资竞争阶段,只要邻里、邻村一个项目取得了发展,马上就会冒出相同或相类似的一大片企业,这些企业只管要投资,上项目,而完全不考虑自身的条件与所模仿企业有什么不同,也不从长远的发展考虑眼前的企业是否符合区域政策的需要等,这样往往造成区域产业盲目发展,使得宝贵的资金在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的不稳定发展中,白白地流失和浪费。西部乡镇企业就是在竞争机制的错位下,陷入了这样一种循环发展的误区:即项目和生产的选择依靠模仿,模仿的结果是产生行业进入过量和激烈的竞争,过度竞争使得企业发展的环境更不稳定,因此,更需要模仿,依次循环。

为什么东部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出现陷入误区的现象,而西部乡镇企业则出现了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西部乡镇企业受农业和农村产业,受城市工业和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没有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二、西部乡镇企业如何腾飞

西部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在于农村产业结构的重农化,即农业比重大。摆脱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就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非农产业,主要是农村工业,这一点的认识是较为统一和清晰的。但在发展西部乡镇企业的操作上则有不同的认识,其中较为普遍的是仍然鼓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利用资本投入总量的扩张和推动,使西部乡镇企业有一个大发展。这种不顾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顾市场环境条件和自然环境条件,硬性发展乡镇企业的做法并不可取。首先,这种方式没有摆脱“动员型经济”的传统发展束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依然采用政府推动,搞运动的形式,这实际上等于在新的形势下用旧的手段来发展乡镇企业。其次,目前西部发展乡镇企业的做法,受传统思路的束缚太重,只是就乡镇企业来发展乡镇企业,而没有跳出这种束缚,从宏观环境的完善上来看如何发展乡镇企业。再次,